

推介翁紹軍先生注釋之 《漢語景教文典詮釋》

顧衛民

(上海教育學院歷史系講師)

「景教」是基督教最早傳入中國的一個支派，在我國又譯為聶斯脫里派。其教祖聶斯脫里是敘利亞人，原任安底奧基亞城隱修院院長，公元428年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對於上帝聖子降生為人，有不同於基督教傳統的見解。教會相信聖母所生的上帝降生為人，是一個耶穌，他則以為這只是上帝聖子結合於聖母所生的人，因此耶穌有了兩個主體。在413年以弗所舉行的一次主教會議上，他被指控為主張「二位二性」的神學異端，遭到革職流放。凡同情和支持他的信徒被稱為「聶斯脫里派」。後來，東方教會中許多人接受了聶派的信仰，並派傳教士到各地宣教。

東方教會的傳道士可能很早就隨著「絲綢之路」的通暢，來到我國。但有確切記載的是，公元635年（唐貞觀九年），景教主教、敘利亞人阿羅本從波斯來到唐都長安，被迎入宮內問道譯經。三年以後，皇帝認為該教「濟物利人，宜行天下」，由朝廷出資營造了一座「波斯寺」。開元時期，玄宗又改為「大秦寺」。781年，德宗下令樹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以資表彰。從這個碑上最早出現了「景教」這個名詞，它證明了基督教早在一千三百多

年以前就傳入了我國。

景教在唐朝活躍了兩百年，一度呈現「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景象。但845年，武宗滅佛，景教亦被株連，從此一蹶不振。五代和宋朝，中原地區無景教活動的記錄，只有西北邊陲蒙古克烈部、乃蠻部、汪古部及新疆的回鶻人依然奉行景教。一直到十三世紀的元朝，西疆和北疆的奉教部族隨蒙古人入主中原而內遷，景教再度出現，時人稱之為「也里可溫」，一直延續到1368年元朝覆亡為止。

景教最重要的文獻資料是1625年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碑文雖然不到兩千字，但它概述了景教在唐朝一百五十餘年的歷史經過及基本教義，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此外，1908年至1949年先後在敦煌等地發現了一批景教頌文和經文：《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尊經》、《志玄安樂經》、《一神論》、《序聽迷詩所（詞）經》、《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大聖通真歸法贊》，它們與景教碑文一起，構成了基督教入華最初的歷史文獻，為漢語基督教思想史上的原始資料。

現在，翁紹軍先生注釋之《漢語景教文典詮釋》由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以「歷代基督教思想文庫」之一種出版了，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翁先生注釋此書，其學術價值在於：

一、自本世紀以來，中外學者致力於景教的研究，在在多有，如英國穆爾《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日本佐伯女子郎《中國境內之景教遺存》、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朱謙之《中國景教》、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龔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等等。這些力作，或是注重於景教歷史行蹟的研究，或是對景教某些教義加以深入的分析，但惟有翁先生的著作，對於以上八篇景教文典的全文，作出了逐字逐句的完整的注釋。江

文漢的著作，只對景教碑文加以現代漢語的翻譯，其他頌文和經文，未曾羅列。羅香林、朱謙之、龔天民諸人，因其為史學專著，對景教教義僅有散見於各章的零星解釋，無集中和全面的注釋。翁著的益處，在於便於後人全面系統地了解漢語景教文典的原始風貌，使人能夠深入細緻地廓清景教文典的翻譯過程並品味其文字上的特點，無論對於研究基督教入華史、中國基督教思想史和中國翻譯史，均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二、在注釋文典的過程中，翁先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見解，啟發了人們的思考。他認為，景教八篇就體裁而言，恰好四篇為頌文，四篇為經文。在四篇經文中，譯述於初唐的《序聽迷詩所經》和《一神論》，出自於阿羅本及其徒眾之手，可稱為阿羅本文典；後二篇《宣元至本經》和《志玄安樂經》可稱為景淨文典。阿羅本文典的特點在於注重福音的宣講，在傳述教義時偏重於基督教神學中諸如神論、宇宙論、人論、靈魂說以及倫理學等內容，敘述時忠實於基督教或都說是景教的本色，具有原典化神學的典型特徵。至於景淨文典的特色，翁先生認為其過分地使用佛道兩家的思想和語言來傳述經典，因而佛道兩教的氣息十分濃厚。作者因而得出結論：由阿羅本文典的原典化傳述類型轉向景淨文典本土化傳述類型，導致了教法義理逐漸暗淡湮沒，這是唐代景教失敗的原因之一。

以歷史的觀點來看翁先生在神哲學上得出的結論，是很有意思的事。阿羅本無疑有很大的貢獻，但關於它的記載太多。景教碑之外，只有光緒三十四年法人伯希和在敦煌發現的《三威蒙度讚》提到「唐太宗貞觀九年，西域大德阿羅本，廟於中夏，並奏上本音。……」高宗時被封為「鎮國大法主」到宋人所編的「長安志」中，已訛為「阿羅斯」，且稱其為「胡僧」。阿羅本是直接從人敘

利亞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太宗對之優禮有加，派宰相房玄齡到京郊迎接，請入宮內「問道」，在書殿裡「譯經」。阿羅本未嘗不想在「天尊十願」中引入尊帝事君為其一願，但摩西十誡中並無尊君之內容，故而最後還是摒棄了迎合變通的作法。他所譯《序經》先是說「事聖上」，及表述十願中之第二願時，還是改成了「十誡」中「孝養父母」之一條，這種以信實為重的作法，保持了基督教傳統的本色，也往往是初到異國的宣教士採取的路線。（翁著第二四一—二五頁）

至於景淨，歷史上留下的資料似較阿羅本為多。他不僅是景教碑碑文的撰述者，根據碑上的敘利亞文，他還是「省主教」（Korepiskopa）兼中國總監督。根據《尊經》所列其譯經目錄，《宣元本經》、《志玄安樂經》為其所譯，另一部是《三威贊經》，大約是《三威蒙度贊》。這樣，現在的景教經典，大部分是出自於景淨之手。可以斷言，景淨及其助手在翻譯時充分與佛教僧侶合作的，也摻入了不少道教名詞。

翁先生舉例說，《宣經》中以「虛通之妙理，群先之正性」來規定「道」，「道」的功能是「生成萬物，囊括百靈」，修道的實質是「復無極」，內真而「無心」，外真而「無事」。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延納了道教的理想，表達的是一種虛空的意境；而基督教福音中的「道」（邏各斯Logos）是為本體的聖靈，兩者相去甚遠。

至於佛教名辭，更是不勝枚舉，最明顯的莫如以「佛」稱上帝，以「世尊」稱耶穌，以「受戒」稱受洗，以「僧」稱教士。歷史上景淨確與佛教過從甚密，甚至協助佛門譯經，時在德宗貞元二至四年（786~788）之間時法師梵名般刺若，請譯佛經，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密經，譯成七卷」，不過因「景淨不

識梵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珠，……聖上睿哲文明，允恭釋典，察其所譯，理味詞疏，……」可見景淨當時必是翻譯名家，他助譯佛經，引起很大的騷動，甚至需「聖上」來干預。

我們同意翁先生的見解，由於景淨在譯經時過多地使用了佛道兩教的語言和觀念，比附基督教教義，以致未能鮮明而準確地傳達景教的本旨，這是景教失敗的原因之一。當然，從歷史上看，景教教士將主要精力花費在結納權貴之上，缺乏下層信眾的基礎，社會上的人們只將它視為佛教的一支，故而上層的政治鬥爭以滅佛形式株連到景教時，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消聲匿跡於歷史的舞台之上。

景教是基督教入華的第一階段，以後又經歷元代天主教東來、明清耶穌會士在華的活動，以及近代新教和天主教大規模輸入等三個時期。作為外來的宗教，基督教始終存在著如何與中國本土文化和社會溝通、融和的主題。景淨使用佛道的語言釋經，以佛道觀念比附基督教教義，可以說以語言和思想（符號和內涵）兩個方面進行了基督教本土化的最初嘗試，有時不免牽強附和，但未嘗不含有使中夏之人理解外來宗教的苦心，其失敗中也蘊含著成功的因素。

通觀景教文典，如《三威蒙度贊》，就是彌撒中的「榮歸主頌」，一開頭就是「無上諸天深敬嘆，大地重念普安和」之句，可以算得上是上乘的譯筆，又如《世尊布施論》所譯：「若左手施，勿令右手覺」，也十分清通明瞭。

由景淨撰寫的景教碑碑文，已將基督教基本的要理介紹給了中國人，而且文辭優美對稱，值得誦讚：如創造宇宙（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先造萬物，後造原祖（匠成萬物，然立初人），人性本善（素蕩之心，本無希嗜），童貞瑪利亞生耶穌（神天喧慶，室女誕聖），救贖（法浴水風，滌浮華以登明宮），上帝自有（先先而無元），三位一體（三一妙身）等等。無怪乎我國著

名天主教史學家方豪也曾說：「就如唐元時代景教，在西方當時目為異端的，可他們所遺留下來的漢文文獻中，卻沒有一絲不合我們教義的」。

基督教入華一千三百餘年，歷時彌久，數起數落，至今有人仍視其為「洋教」。欲改變此種現象，無疑地必須建立本土化的神學思想、教會禮儀和組織。因此研究基督教的本土化——也就是基督教在外方傳播過程中自身的變化，顯得十分重要和迫切。《漢語景教文典詮釋》向我們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原始資料，藉此可以窺見這一過程的最初端倪，領會和體念其中的曲折與艱辛，失敗與成功，實在值得向大家鄭重推荐。